



## 唐代小说中的狐书研究

张玉莲

**摘要:**唐代不少小说叙及狐书。这些狐书虽载体及装束样式与人间书卷无异,但或字形怪异,或文意艰深。这种特点的形成当与唐代佛、道二教的兴盛有关。狐书在小说中起着贯穿故事情节、凸显狐妖形象、彰显文本旨意等作用。

**关键词:**唐代小说;狐书;佛教;道教;叙事功能

唐代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狐神崇拜的流行,狐书作为一个重要的情节元素频频出现在小说中。研究唐代小说中的狐书,不仅能窥知唐代的宗教和民俗信仰,还能揭示狐书在这些文本中的叙事功能。唐代小说中提及狐书的共七篇:张读《宣室志》卷八《墓穴狐语》<sup>①</sup>、牛僧孺《玄怪录·狐诵〈通天经〉》<sup>②</sup>、薛渔思《河东记·李自良》、佚名《张简栖》、温庭筠《干骊子·何让之》、《灵怪录·王生》、戴孚《广异记·孙甌生》<sup>③</sup>。这些小说基本是叙述猎人追捕猎物至冢墓见狐妖得狐书之事,故形成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人追猎物至冢墓——见冢中狐妖——得狐书(或兼杀老狐)。若人狐初遇时老狐被杀,狐书被焚,则情节到此便戛然而止。若人取狐书且未杀老狐,则情节都有进一步延伸,从而出现如下叙事:老狐索书、人狐谈判、人兑现诺言得福或失信于狐遭殃,等等。不难看出,“狐书”在文本中成了决定情节走向的关键因素。

### 一、狐书在唐小说中的样态

就样态而言,唐小说中的狐书不是字形怪异难识,就是文字生僻深奥,故文意难解。如下列引文所述:

《墓穴狐语》:点画甚异,有似梵书而非梵字,用素缣为幅,仅数十尺。

《何让之》:有一帖文书,纸尽惨灰色,文字则不可晓解,略记可辨者。

《李自良》:(两纸文书)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识。

《张简栖》:其册子装束,一如人者,纸墨亦同,皆狐书,不可识。

《王生》:黄纸文书……得其书,才一两纸,文字类梵书而莫究识。

《狐诵〈通天经〉》:取书以归,字不可认识。

《孙甌生》:君得此,亦不能解用之,若写一本见还,当以口诀相授。

从上述记载可看出:第一,狐书的载体及装束样式与人间书卷无甚差别,或是“素缣”,或是寻常文书纸,《张简栖》中则明确指出“其册子装束,一如人者,纸墨亦同”。第二,狐书字体

①张 读:《宣室志》,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108~109 页。

②牛僧孺:《玄怪录》,中华书局 2008 年,第 137 页。

③以上五条载于《太平广记》卷四五三、卷四五四、卷四四八、卷四五三、卷四五一,中华书局 2003 年,第 3700~3701、3706、3661~3663、3699~3700、3688 页。

常常怪异难识,或“点画甚异”、“似梵书”,或“皆古篆”,或“不可识”。第三,偶有可识者,但怪字僻词连篇,文意“不可晓解”,“不能解用之”。

狐书的这种特性,自然是要增加狐书内容的神秘感。而《何让之》中,作者有意“略记可辨者”:

其一云:正色鸿猷,神思化代。穹施后承,光负玄设。呕沦吐崩,垠倪散截。迷肠郗曲,霏(音滕)露(音乙林反)霾噎(入声)。雀毁龟冰,健驰御屈。拿尾研动,株株晰晰。溜用秘功,以岭以穴。施薪伐药,莽澧万茁。呕律则祥,拂伦惟萨。牡虚无有,颐咽蕊屑。肇素未来,晦明兴灭。

其二辞曰:五行七曜,成此闰余,上帝降灵,岁旦湛徐,蛇蜕其皮,吾亦神摠。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纳太虚。何以蔽蹠?霞袂云裾。哀尔浮生,栉比荒墟,吾复丽气,还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济忽诸。题云《应天狐超异科策八道》。

这篇狐书题《应天狐超异科策八道》,是此狐参加天庭天狐考试的试策。狐书通篇四言,句式整齐。观其内容,如“拿尾研动”、“溜用秘功”、“五行七曜”、“吐纳太虚”等,皆与道教思想息息相关,内容是神秘的,同时,大量生僻语词的运用造成文意的“不可晓解”,也就更增加了狐书的神秘感。

狐书出现甚早,晋代不少文献皆有相关记载。伏滔《北征记》云:“皇天坞北古特陶穴,晋时有人逐狐入穴,行十余里,得书二千卷。”<sup>①</sup>据李剑国先生考证,这是狐书之始<sup>②</sup>。惜伏滔未对狐书的具体内容作说明,故难知其详。不过,从该记录未明示其间有何特殊之处可大致推测此狐书当与人间寻常书籍无异。这一点,唐前不少志怪小说的记载可为佐证。晋干宝《搜神记》卷一八《胡博士》中化形为人的狐妖即胡博士,“以经传教授诸生,尝借诸书”,其所授所借之书自是寻常的儒家典籍。刘宋陶潜《搜神后记》卷六《古冢老狐》中老狐的簿子上记录的是被其奸淫的女子之名。这些“狐书”,从书写形式到内容都无特异之处。这可能是由于汉魏六朝的狐妖绝少道术化法术化者,故无需来自天界的狐书作为修炼依托。如郭璞《玄中记》所记狐在不同年龄所能幻化之物<sup>③</sup>,强调的是年龄的增长与幻化物之间的关系。即使如《搜神记·斑狐书生》中的通天狐妖,其之所以具有非凡才识,小说突出的主要还是其有“千岁之质”这样一个年龄事实。这种认识当是基于其时流行的“老物成精”<sup>④</sup>观念。

但到唐代,民间普遍流行狐神崇拜<sup>⑤</sup>。张鷟《朝野僉载》佚文“狐神”条云:

唐初已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sup>⑥</sup>

在“无狐魅,不成村”这种狐神崇拜的盛况下,狐妖狐神故事的大量产生自不足为奇。民间如此崇拜狐神(主要是术狐和天狐),自然与此期的狐观念有关。唐人相信,术狐经过修炼,力能通天,具有作威作福的能力。牛肃《纪闻·袁嘉祚》中老狐就说:“吾神能通天,预知休咎。愿置我,我能益于人。”<sup>⑦</sup>法术高超的狐神,甚至“可以祸福中国”(《何让之》)。因此,民间对狐神多采取谄事态度,奉之以避祸祈福,如上引《朝野僉载》所言“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同时,佛道修炼观念使人们认为,狐妖要成为本领非凡的术狐或天狐,亦须经过修炼之途。而修炼一般需要相应的理论指导,如此,记载修炼口诀之类的“狐书”就成为狐妖不可或缺的修炼凭藉。在此背景下,有关狐书的狐妖故事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唐人小说中。

①见引于《太平御览》卷九〇九,载《四部丛刊三编》,上海涵芬楼影印宋刊本。

②李剑国:《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

③《玄中记》云:“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神通,为天狐。”见鲁迅:《古小说钩沉》,载《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58页。

④如汉人王充《论衡》卷二《订鬼》云:“夫物之老者,其精为人;亦有未老,性能变化,象人之形。”(王充:《论衡》,中华书局2006年,第935页)这种观念为晋人所继承,如,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一七《登涉》云:“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葛洪:《抱朴子内篇》,中华书局2002年,第300页)干宝则明确解释了老物能成精的原因。《搜神记》卷一八《五酉》云:“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久者神皆依凭,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酉者老也,故物老则为怪矣。”(干宝:《搜神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295页)云精怪乃被神依附的老物。

⑤关于唐人的狐神崇拜,可参见李剑国:《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13~123页。

⑥载《太平广记》卷四四七,中华书局2003年,第3658页。

⑦载《太平广记》卷四五一,中华书局2003年,第3688页。

## 二、狐书在唐小说中的文化蕴涵

狐书字形的怪异和文意的难晓,当与唐代佛教、道教的兴盛密不可分。

上面所举七文中,有两篇即《墓穴狐语》和《王生》中提及狐书“类(似)梵书”但皆非梵字而不可识。按,梵是梵摩的省称,意为“清静”、“寂静”,本是婆罗门教的宗教用语。梵文是用以表记梵语的字体,据说它的前身“婆罗米文”是婆罗门教的创造之神“婆罗马”(意为“梵天大帝”)创制的。梵文不仅是印度的古典文字,也是佛教的经典字体(悉昙体)。这种文字随着佛教典籍的大量传入中土而逐渐为汉民族所了解。至唐代,“随着新一轮求法高潮的兴起,玄奘、义净等精通梵文的大师从印度返回中国,引进和介绍了更加准确、全面的梵文知识,梵文字母拼音知识遂以悉昙章的名称流传开来。”<sup>①</sup>由于梵文本身的特点,对不习惯“表音”符号的中国人而言,梵文显得深奥难懂。周一良先生云:

(梵文)是一种语根变化最复杂的语言。名词有八种格。……数目除单复之外,还有双数,动词的过去式也有许多种。

因为中国文字不是表音的符号,加以梵文字母的诡奇难辨,悉昙之学便显得奥妙非常了。<sup>②</sup>

为使更多人懂梵文以便深入了解佛教,著名的译经人义净不仅写了《梵语千字文》以介绍佛教相关知识,还在“译缀之暇,曲授学徒”<sup>③</sup>。梵文学习开始只是在僧侣间进行,后来一部分好佛士人也加入其中,并以能习梵音、书梵字为博学,中书舍人苑咸就因“能书梵字,兼达梵音,曲尽其妙”<sup>④</sup>而赢得王维的赞赏。王维本人不仅以佛教用语为名(维)与字(摩诘),且被誉为“诗佛”,其对梵文亦当有一定了解。这些事例既可见出唐人习梵文之风气,亦表明梵文之难懂。在此背景下,那些创作狐书小说的文人们,将狐书神秘化为“似梵文”而“非梵文”的怪异之文亦在情理之中。

作为唐代国教的道教,对狐书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表现之一是狐书的字体。《王生》中狐书是“天书”,《李自良》中狐书为“天符”,《狐诵〈通天经〉》中狐书乃《通天经》。三者名目虽异,但应都属于“天书”范畴。“天书”本是指来自上天之书,所谓“神授天书”是也,后来成为道教基本术语,据说是元始天尊所传:

(元始天尊所说之经)凡八字,尽道体之奥,谓之天书。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辉照耀,惊心眩目,虽诸天仙,不能省视。<sup>⑤</sup>

关于天书的形成及字形,唐孟安排《道教义枢》卷二《十二部义第七》有具体说明:

一者天书,阴阳初分,有三元五德八会之义,以成飞天之书,后撰为八龙云篆明光之章。

何谓“三元五德八会”、“云篆”?该文接着阐释云:

三元者:一曰混沌太无元高上玉皇之气,二曰赤混太无元上玉虚之气,三曰冥寂玄通元无上玉虚之气。五德所本有。三即阴阳和。阴有少阴、太阴,阳有少阳、太阳,就和中之和,为五德也。篆者,撰也。撰集灵书,谓之云篆。此则三元八会之文,皆是天书也。<sup>⑥</sup>

则此所谓“天书”是由阴阳调和三种元气而成,其字体被称为“云篆”。一般来说,云篆之形似云气之状,类于篆文。这一点,可从考古材料中找到证据。1973年,资阳县城南乡汉代崖墓中出土一方道教铜印,印文共6行,每行5字,共30字(见图),形似篆文,又不全是篆文<sup>⑦</sup>。这种特点在小说中亦得到反映。《李自良》中云狐书“字皆古篆,人莫之识”。该狐书不能为人识别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其字形貌似古篆而非古篆。此外,云篆亦有类似梵书者,《云笈七签》卷七《三洞经教部·本文》“云篆”条下即云:“又有云篆明光之章,为顺形梵书。”<sup>⑧</sup>《王生》中被称为“天书”而字“类梵书”的狐书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形。这种特

①何方耀:《汉唐求法僧梵文学习之特点及其社会影响浅论》,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第78页。

②《周一良集》第3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9页、224页。

③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第3页。

④王维:《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载《全唐诗》卷一二八,中华书局1987年,第129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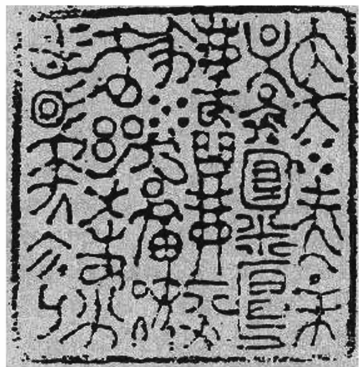
⑤《隋书·经籍志》卷四,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139页。

⑥《传世藏书·字库·道典》,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394页。

⑦冯广宏:《巴蜀文字的期待》(六),载《文史杂志》2004年第6期,第16页。

⑧《云笈七签》,齐鲁书社1988年,第33页。

殊字体的产生,应是佛道二教相互渗透的结果。



来源于冯广宏:《巴蜀文字的期待》(六),载《文史杂志》2004年第6期,第15页。

“天符”即上天神灵之符。作为沟通凡人与神鬼的媒介,符的形状怪异,功能有别,并非常人所能知晓,故有“画符不知窍,反惹鬼神笑;画符若知窍,惊得鬼神叫”之说。因之《李自良》中号称“天符”的狐书也使“人莫之识”。

《通天经》大概就是葛洪所说的《通天符》之类。据葛氏称,《通天符》是其师郑隐君藏书中的“大符”。又说,“郑君言符出于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于神明,符皆神明所授。”<sup>①</sup>传授天符时,神明会以云气之形将其旨意彰显,而能通于神明者遂仿其形而录之,所录符号或图形,就成为道教的一种特殊字体,即前所言之“云篆”。

表现之二是狐书的来源。以上所引七文中,有两篇(《王生》、《李自良》)提及狐书来自上天,是为“天书”。其它狐书虽无明确来源,但据前来讨狐书的狐妖之言,亦当得诸上天。正是由于此,这些来历非凡的狐书,非凡人所能识别,亦非凡人所能习读和拥有。《孙甌生》中狐妖对孙甌生说:“君得此,亦不能解用之。”《狐诵〈通天经〉》中老狐说:“《通天经》,非人间所习。”《李自良》中老狐云:“某非世人,以将军昨日逼夺天符也。此非将军所宜有。”来历不凡恐怕也是狐书最终被毁或被狐设法取回的重要原因。

表现之三是狐书的内容。那些得诸上天的狐书最终基本失之人手,故难考其详。但从《何让之》中那篇狐妖应试书片段中,亦可窥知道教对狐书影响之痕迹。其文有云:

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纳太虚。

言狐妖修行完满成为“天狐”后,在天庭规规矩矩,通过吐纳太虚的方式充饥并修道。“吐纳”乃吐故纳新之意,本为道家养生之术,《庄子·刻意》云“吹响呼吸,吐故纳新”。随着道教的兴起,它逐渐成为内丹修炼的一个重要内容。《抱朴子内篇·微旨》:“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矣。”<sup>②</sup>吐纳也叫行气,按照葛洪的说法,求神仙之至要“在于宝精行气”,而行气“之大要者,胎息而已”<sup>③</sup>。胎息,是在呼吸调节达到一定程度时,神气相结,鼻息若有似无,呼吸似在脐部进行,如同胎儿在母腹中一样。在唐代,由于道教大兴,吐纳之术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这一时期还出现许多相关论著,如张果《太上九要心印妙经》,罗公远、叶静能注《真龙虎九经》,崔希范《入药镜》等。如此,那些想攀跻天庭成为神仙的狐妖们的修炼依托——狐书——中出现“吐纳”之类的道教内容亦属自然。

毫无疑问,这些字形怪异,来历不凡的狐书给狐妖们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相应的,狐妖们不是与僧人搭上关系,就是被塑造成道士模样。如《何让之》中前来帮狐妖讨狐书的是僧人志静,化形为老翁的狐妖“姿貌有异常辈,眉鬓皓然,著绛帔巾襦袴,幘乌纱”,颇有世外高人之风。《李自良》中老狐则直接化为“道士”立于棺前。不仅如此,狐妖们的修炼之所亦符合道教的相关要求。上引小说中的狐妖,多是躲在古墓空冢潜心修炼。《墓穴狐语》中是在墓穴,《何让之》中是在后汉诸陵丘,《李自良》中是在古圻,

① 葛洪:《抱朴子内篇》,中华书局2002年,第335页。

② 葛洪:《抱朴子内篇》,第124页。

③ 葛洪:《抱朴子内篇》,第149页。

等等。这一特殊修炼场所的选定,既与狐“墓居”的生活习性有关<sup>①</sup>,亦是出于道教对修炼环境的特定要求。道教修炼最讲一个“静”字,要修炼,首先要“入静”,因此修炼之所最好是清净之地。宋俞琰说:“处空房者,入静室也,其中不着他物,惟设一香一灯一几一榻而已,坐处不欲太明,太明则伤魂,不欲太暗,太暗则伤魄……然静室亦不必拘以山林,或在廛中,或居道乡,但得所托,无往不可。”<sup>②</sup>修炼环境之“静”能帮助修炼者调整精神状态,使之静心凝神,快速达到“入静”的修炼状态。这也正是许多道士选择僻静清幽之山林作为修炼场所的主要原因。同样,狐妖们的修炼之所“墓穴”,尤其是古墓,幽暗清净,绝少外界干扰,正好符合道教对修炼环境的特定要求。

狐书作为术狐的修炼依托,关系其前程命运,故被狐珍视若命,所谓“狐有天书狐自珍”<sup>③</sup>是也。甚至在性命受到严重威胁时,狐妖不是忙着逃命,而是想着保全狐书。《张简栖》中,正“凭几,寻读册子”的老狐惊闻张简栖的怒呵,“惊走,收拾册子,入深黑穴中藏”。正因为狐书为术狐宝惜,一旦丢失,狐总要想方设法取回。《李自良》中,老狐以使夺狐书者得高官为条件换回狐书。《狐诵〈通天经〉》中,老狐先是重金利诱,继而用计——化形为夺狐书者之内兄——骗回狐书。化形赚回狐书的计谋亦被《张简栖》、《何让之》、《王生》中的老狐所采:他们或化为夺狐书者的知己,或化为抢狐书者的亲属。总之,为了狐书,狐妖们费尽心机。

### 三、狐书在唐小说中的叙事功能

狐书作为上述狐妖小说的核心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方向和文本的叙事模式。在狐书小说中,狐书犹如穿珠之线,对小说情节的编织起到统摄作用。《墓穴狐语》中,林景玄捣毁墓穴后,捕杀了现出原形的老狐,并焚其书。叙事随着狐书的被焚而终结。更多小说的情节则因狐书被人夺走而变得波澜迭起。《李自良》中,狐书被李自良夺走后,老狐欲以“厚报”为条件换回其书,自良不应。老狐又登门拜访,承诺三年内能使自良“致本军政”。自良心动而恐其言不实。在老狐展示了其能令仙人玉童相迎的非凡本领后,这个交换协议得以达成。后年秋,自良果“拜工部尚书太原节度使”。显然,人狐间的数次谈判,老狐的高官利诱,自良的被举荐等情节,全因狐书而出现,并因狐书得以串联。同样,《张简栖》中,狐书被张简栖夺走后,老狐夜夜来索。简栖深异其事而欲以书示人,于是生发出张道逢“知己”,狐书被狐骗回的情节。《王生》中,老狐夺狐书不成,遂报复王生使之流离失所,最终又设计夺回狐书。这些小说中,人狐古墓初逢后的道上邂逅以及其后一系列情节,皆因狐书而起,进而因争夺狐书而变得迂回曲折。

狐书的出现不仅延伸了小说叙事,强化了故事情节的悬念感,还使小说空间背景得以自然衔接和转移。狐书小说的叙事,都是在狐书这个必要因素的驱动下进行,相应地,叙事的空间场面亦因狐书的转移而发生变化。当然,狐书的转移又是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完成的。一般是从古墓转移至人居。如《狐诵〈通天经〉》、《何让之》中都是从古墓转移至夺书人住所。《张简栖》中的空间转移较为复杂:古墓→张简栖家→道上→张简栖知己家。其中,发生于“道上”的情节极富情趣。它栩栩如生地刻画出狐妖骗走狐书后化为原形时的得意劲以及张简栖被骗之后的懊恼劲。而这个经典情节,正是从叙事场面的转移中延伸出来的,若无狐书从“张简栖家”至“道上”的空间转移,狐妖就没有机会与持狐书的张简栖的“道上”相逢,进而骗回狐书。从这个角度看,狐书对叙事场面的勾连衔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推动整个叙事进程的关键因素。

争夺狐书的情节还使狐妖的智慧形象充分彰显。狐妖们面对人对其法宝“狐书”的横加抢夺,不是无奈地哀求,便是冒着生命危险上门求索,显得弱小无助。但在与人的交涉中,它们非凡的智慧得以尽情发挥,并最终战胜了貌似强大的夺书人,使小说的叙事极富戏剧性。个中以《张简栖》中的狐妖为典

①据笔者统计,《搜神记》有三则小说《阿紫》、《胡博士》、《斑狐书生》写到狐居古墓,《搜神后记》卷六《古家老狐》亦言及狐居古墓,《太平广记》有十八条叙及狐妖出没于冢墓间。由于墓居的生活习性,狐又有“玄丘校尉”之称。

②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卷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六《小水湾天狐诒书》,明天启叶敬池刊本。

型。文记狐书被张简栖夺走后,老狐夜夜上门求索。又惧为人所捕,于是采取夜至而日走的游击战术:每至,立于宅外叫索不停。“出觅即无所见。至明,皆失所在。”无可奈何的张简栖携书出门欲求人以观,老狐非常识时务地抓住了这个难得之机:

(简栖)因携册子入郭,欲以示人。往去郭可三四里,忽逢一知己,相揖,问所往。简栖乃取册子,话狐状。前人亦惊笑,接得册子,便鞭马疾去。回顾简栖曰:“谢以册子相还。”简栖逐之转急,其人变为狐,马变为麀,不可及。回车入郭,访此宅知己,元在不出,方知狐来夺之。

老狐拿捏准了人类对亲朋好友普遍持信任态度的心理,化作张简栖的知己,使之毫不设防地出示册子。小说以非常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这对“知己”极富戏剧性的邂逅情景:相遇时的寒暄,“相揖,问所往”;简栖毫无顾忌地“取册子,话狐状”;老狐故作惊讶地“惊笑”、“接册子”。一切言谈举止都那么入情入理,一如知己间的不期而遇。得书后老狐回顾时之言“谢以册子相还”,更是把其计谋得逞时的得意神情活画出来。老狐的机智不仅反映在它善于揣摩人的心理,还体现在其为安全逃离所做的充分准备。得册子后,老狐“鞭马疾去”。“简栖逐之转急,其人变为狐,马变为麀。”按,麀即獐,属于鹿科,体长近1米,行动非常敏捷,奔跑时常为窜跳式,还能游泳。老狐为了能及时逃脱追捕,竟然把獐这位兼擅长跑和游泳的“体育健将”都请来,可谓考虑周密。事实也证明了老狐的先见之明:在“简栖逐之转急”的情况下,老狐乘着这位水陆兼通的坐骑逃之夭夭。这种化形骗人的伎俩将狐的狡黠之性表现得非常充分。“在全部妖怪传说中,只有狐的才智才受到突出强调,其它妖物莫能相比。”<sup>①</sup>狐妖们不仅狡黠,对人情世故亦颇洞达。他们在设法取回狐书时,往往投其所好。《何让之》中狐妖以“三百缣”为交换条件,《李自良》中老狐以高官利诱,《狐诵〈通天经〉》中狐妖以重金营惑。人间惯用的交际手段统统被狐妖们用到取回狐书上。

狐妖设法赚回狐书的情节还折射出狐妖的某些价值取向。一方面是狐妖兑现诺言而体现出的诚信品质。《李自良》中,老狐为取回狐书,以使李自良三年内“致本军政”为条件。第三年秋,自良果然被上司马遂和宰相“稀里糊涂”地举荐为工部尚书太原节度使。文记马遂在回答皇帝“谁可代卿者”之问时,“昏然不醒,唯记自良名氏”。明日复问时,这位曾私誓其心必荐德高望重者的马遂,“依前昏迷,唯记举自良”。更蹊跷的是,上复以此事问宰相,宰相亦“愕然,不能知其余,亦皆以自良对之”。显然,马遂的两次“昏然”与宰相的“愕然”都是老狐暗中捣鬼以助自良的缘故。另一方面是人失信而遭到狐妖报复所体现出的道德法则。《何让之》中,老狐请僧人志静与何让之交涉,欲以三百缣换回狐书,让之诺而纳其绢。待志静复来取书时,让之悉讳其事,云不曾收其缣已亦无狐书。老狐遂设计赚回狐书,并栽赃让之,使其卒获盗贡绢之罪。何让之不能自雪而“卒毙枯木”的悲惨结局,显系老狐对其失信行为的严厉惩罚。说到底,狐妖对人的善报或恶报,反映的是诚信为本这一人间普遍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

综上,唐代小说中的狐书,往往字形怪异或用词生僻,因而文意难晓。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佛道二教的兴盛及民间狐神崇拜息息相关。在狐书小说中,狐书作为必不可少的叙事要件,不仅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起着导向作用,而且对小说空间背景的转移、狐妖形象的塑造、文本旨意的表达等都有重要意义。

● 作者简介:张玉莲,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云南 呈贡 650500。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YJCZH291)

●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 李剑国:《中国狐文化》,第75页。